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 主编

GIFTS,FAVORS,AND BANQUETS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杨美惠 著

赵旭东

孙珉

合译

张跃宏 译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GIFTS, FAVERS, AND BANQUETS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杨美惠

赵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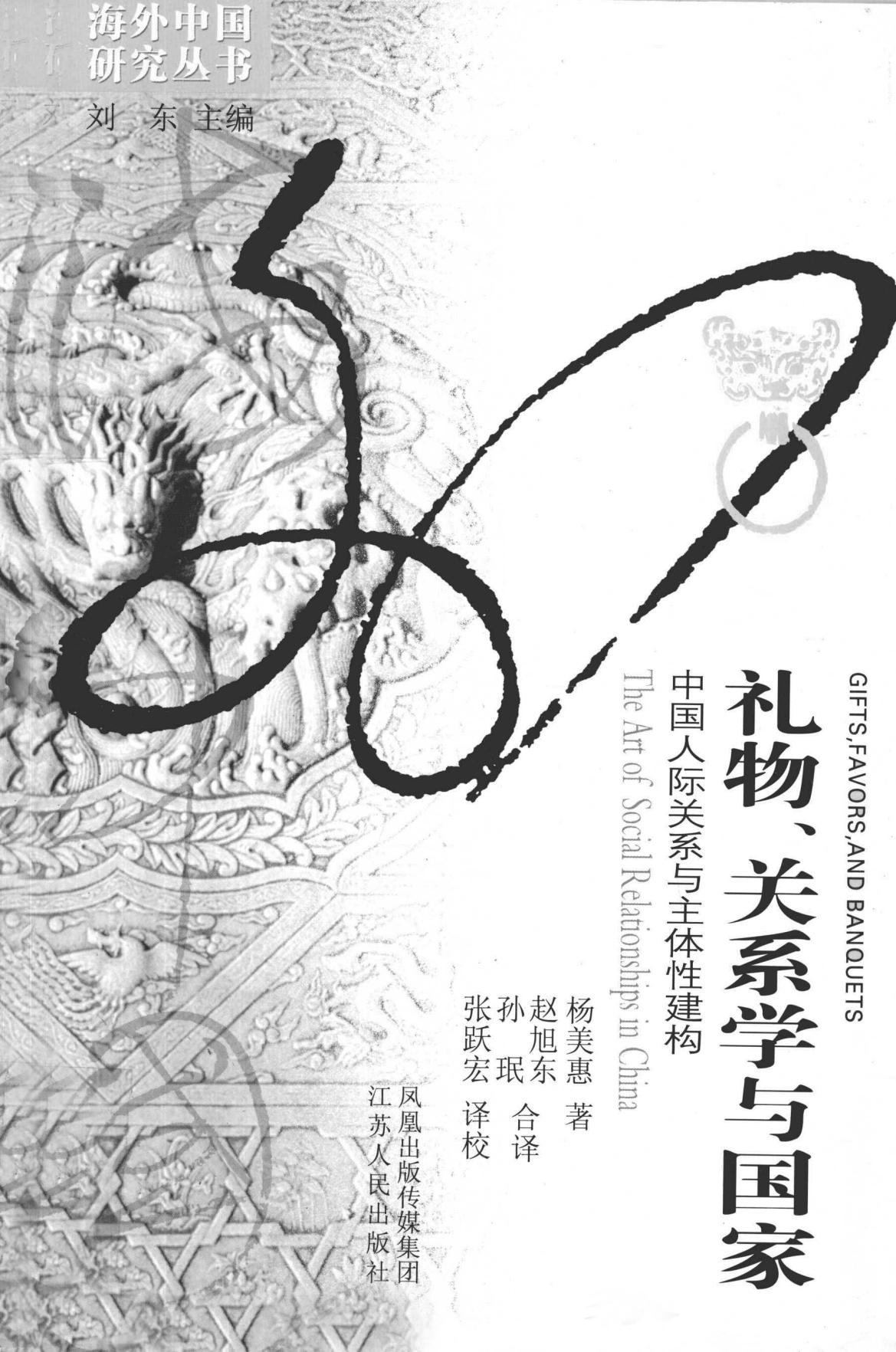
孙珉

著

张跃宏 合译

译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杨美惠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 - 7 - 214 - 05778 - 5

I . 礼... II . 杨... III . 人际关系学—研究—中国

IV . G91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7200 号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by Mayfair Mei-hui Yang,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4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08 - 116

书 名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著 者 杨美惠

译 者 赵旭东 孙 琨

责任编辑 王 田

装帧设计 刘萼萼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南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南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5778 - 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逐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礼记》

致 谢

在做研究和写作本书时,我曾经获得过中国和美国的机构和个人无以记数的情谊。我首先便要感谢埃瑞克·怀特(Eric C. White)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支援和启发,并且还阅读了我的大部分手稿。另外两位读过整部手稿,并给出过大量而又有益的评议的人是大卫·莱汀(David Laitin)以及我的同事爱尔文·哈奇(Elvin Hatch)。

我还要感谢下面的一些人,他们在提供和解释田野资料方面,或者是在对本书的各个章节的阅读和评议方面,都给予过有价值的帮助。他们是:安·安纳格诺斯特(Ann Anagnost),塔尼·巴娄(Tani Barlow),巴顿·本尼迪克特(Burton Benedict),邓方(Deng Fang),金·德沃斯基(Ken Dewoskin),曼莎亚·迪瓦拉(Manthia Diawara),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罗·埃根(Ron Egan),罗杰·弗瑞的蓝德(Roger Friedland),塔玛·高登(Tamar Gordon),阿布杜·简莫哈穆德(Abdul JanMohamed),艾略特·朱瑞斯特(Elliot Jurist),大卫·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本亚明·李(Benjamin Lee),刘禾迪(Lydia Liu),罗小朋(Luo Xiaopeng),杰克·波特(Jack Potter),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麦克·斯考恩哈尔斯(Michael Schoenhals),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唐奔(Tang Ben),伍晓明,阎云翔和杨小东。在本书后期写作中得到帮助的人中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孙红、庄珠丽、康小飞和陆美华以及感谢李卫民帮助作的索引。

没有研究经费和基金会负责人及其机构的鼓励,这本书的完成也是不大可能的。我要感谢下面的一些机构和个人,是他们对我的研究计划给予了帮助。对于研究基金会来说,我要特别感谢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东亚研究所,伯克莱分校的米尔斯国际关系交流学者基金会,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圣塔芭芭拉分校教师生涯发展奖金,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跨学科人文中心以及国家科学基金总统青年研究者奖。对于促成我的文献研究,并完成本书的研究机构来说,我要感谢的是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提供给我的博士后研究机会。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心理社会研究中心邀请我所作的演讲。

我还要感谢中国的机构对于我的多次去中国的接纳,他们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温州市政府。毋庸赘言,本书所表达的观点由我自己负责,并不反映这些机构的意见。

本书中所使用的中文名字除了著名的人物之外都是虚构的,或者除非是这个人本人允许才会用真名。

除特别标明之外,全部的中文的翻译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我对于中文版的已经有的英文翻译所作的略微的修改都标出了星号。

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的浮动,在 80 年代官方的比率是 4 元人民币兑换 1 美元,到 1990 年是 5.7 元兑换 1 元,1993 年的黑市交易是 8 元兑换 1 元。最后,我还要感谢两本杂志允许我使用最初曾经发表在这两本杂志上面的文章,它们是《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Yang, 1989a; 此次使用得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慨允)以及法文的杂志《年鉴》(*Annales*)(Yang, 1991)。

杨美惠

中文版前言

由于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同时拥有更多不同的读者,一本书的翻译出版是很令其作者兴奋的。本书的英文原版于 1994 年在美国出版,其读者层是英文读者,特别是美国的英文读者。在我期待该书的中文版问世的同时,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和畏惧。对于一个处在西方世界,以别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最令人快慰,同时也最不确定的是,这一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并请教过的人们对于其著述的接受。一本人类学著作不仅必须忠实地描述当地人活生生的生活经历,而且必须能够准确地捕捉当地人经历中的重点,令人信服地展现其社会和历史意义,并在这一展现中提供以当地人的目光发掘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本人类学著作能够打动当地读者的心弦,它将激发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一对话将产生对于当地人的社会和人类学家新的洞见和犀利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学实践,它是我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中总共长达两年的对于中国都市的田野调查的结果。与许多中国国内已经出版的关于关系学的书籍不同,本书并非一本教人如何成功地从事商业交往,或者如何有效地与当官掌权的人打交道的指南。本书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运作,并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更具体地说,本书分析了在中国进

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了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而主宰和统帅了整个社会秩序。本书展现传统文化的构成因素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及与通常的视之为“封建残余”的看法不同,本书展现关系学是如何在与当代权力模式打交道时成为中国文化的力量和韧性的源泉。

尽管本书深受当代西方社会批评理论[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基由斯·德乐兹和费力克斯·嘎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等的著作,以及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西格蒙特·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早期思想家的著作]的启迪,但本书特别地探求这些理论的具体性、这些理论所出现的不同历史范围和联系,以及它们对这些具体性和不同性的解释,并探求中国现代化的现时刻中的历史性。比如,第六章讨论了中国古代国家传统是如何深深地存在于现代国家之中的。为了使本书所讨论的关系学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一焦点包含更多新的见解,我为此中译本写了一个后记,以讨论今日中国的关系学和新的商业社会的联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影下的中国。

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赵旭东先生,是他首先建议并着手将此书译成中文。同时,也感谢高波和李江颐对翻译此书作出的贡献。另外特别感谢王铭铭教授对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

1999年9月于
美国圣塔芭芭拉

目 录

致 谢 / 1

中文版前言 / 1

导 论 在中国的田野工作、政治与现代化 / 1

关系学的“发现” / 1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关系学 / 5

在一种恐惧文化下的田野工作 / 14

人类学家的主体位置 / 22

中国现代性的国家规划和本土批评 / 27

第一部分 在一种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微观政治学的民族志 / 41

第一章 关系的方言和辞汇 / 45

民间话语 / 46

官方话语 / 53

民间话语中的关系学的关键字和概念 / 58

第二章 关系的范围和使用的背景 / 67

城市与乡村 / 67

2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 性别层面 / 70
- 城市职业阶层 / 75
- 使用背景的多样性 / 80
- 看门人的社会 / 87
- 企事业和行政场合的用法 / 89

第三章 关系学中的“艺术”:伦理、计策及礼仪诸方面 / 95

- 关系基础:亲属制度、朋友关系以及其他私人关系 / 97
- 情意:义气、感情和人情 / 103
- 扩大关系网 / 107
- 给予和接受的计策、义务和形式 / 109
- 回馈的义务 / 119

第四章 关系学最近的历史:传统的形式和历史的再现 / 125

- 三种官方的历史 / 125
- 关系学和中国文化 / 127
- 1949年以后的关系学的兴衰 / 130
- 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市场力量的进入 / 135
- 关系艺术并未销声匿迹 / 141

第二部分 理论框架 / 147

第五章 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 / 153

- 国家再分配经济中的权力技术 / 155
- 礼物经济中的反技术 / 162
- 命 题 / 176

第六章 “借古非今”:古代中国的仪式伦理与国家理性 / 180

- “批林批孔” / 181
- 重新解释过去 / 186

第七章 毛崇拜、关系的主体和个体的回归 / 207

红色风暴：国家主体和毛崇拜 / 209

个体主体的回归 / 235

关系主体性的增减 / 241

第八章 中国根茎式的关系网和民间组织 / 246

个体与社会之间 / 253

个体与团体或协会之间 / 257

根茎式的亲属制度与关系政治：从“关系网”到“民间” / 261

结 论 返回到实地 / 268

交换的阴柔的力量 / 268

作为一种民间自我组织媒介的仪式 / 273

人情胜过关系 / 275

后 记 / 277

附 录 / 284

参考文献 / 303

导 论 在中国的田野工作、政治与现代化

关系学的“发现”

1982年,在北京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骑车与朋友杜若奔去看望他“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在工厂认识的一个工人。若奔那年三十多岁,是个研究生。他和一位老同学定期到北京大学找我练习英语,过了几个月,我们熟悉以后,他几次向我说起一种叫“关系学”的社会现象,说这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值得探究。晚上若奔要给我介绍他的工人朋友丁健,他不仅关系学做得窍门精通,而且放言无忌。

从1981年9月起,我是在北京大学留学的美国交换学生。访问丁健前的几个月,我对关系学的人类学兴趣被激发了起来。“关系”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客体、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不仅可用于夫妻、亲属和朋友的关系,也有“社会联系”的意思,这种双向关系建立在潜在的(而非明显的)互利的基础之上。一旦两人之间建立了关系,一个人就会抱着将来某个时候回报所接受的好意的想法,来要求另外那个人帮忙。我生在台湾,双亲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对各种中国人圈子里的送礼、维持人际关系的文化重要性已有认识。在那个晚上,我发现这套关系学的实践在中国大陆

不仅更加深思熟虑、愈演愈烈，并且带上了政治和经济的有意思的曲折的涵义。

我们骑车穿过许多窄小的胡同，两边高墙内是居民的院落，我问若奔，他的朋友第一次和一个美国来的人交谈，会不会觉得不自在。在1982年，中国刚对外开放，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文化氛围还依然是对“外国人”或“海外华人”的接触保持警惕，以免被指控为背叛国家。

在敲朋友的门之前，他安慰我说：“他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谈中国社会的。别告诉他你是外国人，否则他会很紧张，甚至像他那样的人也不会跟你说什么的。这些事我来处理，我会向他解释的。”

他的朋友开了门，招呼我们坐下。看起来他也就三十五岁左右，豪爽、健谈，圆圆的脸很滑稽，从容地做出各种手势强调他的论点。我还没张口，若奔就已经介绍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研究社会学这个新领域。因为所有生活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过的，是“书房里的花”，现在觉得有必要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更多的“底下的情况”。换言之，若奔含蓄地想让丁健对我的家庭背景有一些具体印象：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其次，我出身优越，可能是高干的女儿，人们可能乐意与之交朋友。^①

这个始料未及的介绍让我很吃惊，我整个晚上都焦虑不安。至少在我看来有点像，我的中国官话也流利得可以让人误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北京话不地道也可以解释为我生在南方。但我的感觉或举止确实像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大的，这个社会对我来说，仍是个充满着未知的巨大领域。对我来说，要在“海外华人”这个形迹可疑的身份和同样充满疑问的“美籍华人”身份之间平衡一种精神分裂般的分离已经够困难的了。现在我又不得不扮演一个出生和成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好身不由己继续欺骗着可怜的丁健，努力按我自认的出身显赫的大陆中国女性的

^① 后来，我离开丁健家以后，我问若奔在“文化大革命”巨大的社会混乱以后，当精英分子们被下放向群众学习，仍存在着有特权的人，还受到社会的庇护，没有被历史事件触及时，他以神秘和无所不知的态度回答说：“中国还有许多事你需要明白，中国的事很复杂。”这句话我在中國听过许多次。

可能的样子表演。这个企图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重重,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只是在中国电影里见过一两次这样的描述。我尽可能地表演,我希望我的羞涩、紧张的态度,以及我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都被认为是我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而被忽略掉。若奔神态自若,讨论过许多话题以后,他很机巧地把谈话引上了路。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些时候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说说关系学是怎么回事?”他站在我的一边催促丁健。

如下是谈话的摘要,这是我根据谈话笔记和回忆对那次直接谈话的重构。重写的记录把实际谈话中的语气和转场的话题都删掉了。在田野工作中,我学会了避免当着人面记笔记,除非这个人我很熟,我怕我的举动让人警觉、谨慎,甚至怀疑。更多的问题是用录音机随机采访的,在采访官员时,这种方法很管用,他们常用字斟句酌的正式官方语言向群众说话。

丁健身体前倾,很耐心地解释:“关系学对人是有好处的。每个人都用他们的关系网,你请一个朋友帮忙,如果他办不了,他会请另外的人。这样底层就能和高层联系上了。你可能知道高干是怎么得到社会上的消息的,并不是靠秘书的报告,而是靠子女和下层的朋友。”

“你的意思是下层和高层靠相互帮忙联系起来?”我问道。在心里又把自己变成人类学者的角色。

“这中间有好多层次,我想,下层有一种需要,通过很多人到了上面,上面帮了这个忙。像我吧,我出身不好(他的家庭出身是坏阶级,诸如旧社会的地主或资本家,结果他在新社会的政治地位就低)。文革期间,我们厂生产纪律松弛,我很少去上班,和小流氓混在一起,倒卖偷来的东西。‘四人帮’倒台后,我学好了,想进夜校学习中国历史,要学五年才能毕业。在夜校,关系网扩大了,我碰到城里许多不同单位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的中层。我文革时期与底层的人有联系,在夜校又与中层的人有了联系,我的关系网范围够大的吧。”

接着,他兴致勃勃、充满自豪地反复说起最近他如何用关系所做的漂亮事。一天,他认识的一个医生请他搞四副昂贵稀有的中草药,与这位医生有关系的医院和药房里都没有这种药。一副二级中药要

花 49 块钱,一级的要 80 块钱。^① 他知道自己与这位元医生的关系是要好好培养的,于是很爽快地把这事揽了过来。因而,他“马上发动自己的关系网”。整个上午,他骑车跑遍全城,找各种熟人和关系。

觉得许多关系都用不上之后,他偶然走访了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医院的一位助理医生,这位朋友直接帮不上忙,因为这类药的配药规定极其严格,需要专家级医生的处方。但是这个朋友可以介绍他熟悉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专家级医生关系不错,可能说动医生开这个处方。于是丁健拿了助理医生的条子去找他朋友的朋友。丁健告诉这个人他想要的东西以后,这个人眼睛盯着他说:“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吗?这东西是给吃高级饭、拉高级屎的人吃的。”但是,他还是同意带丁健找医生。他在北京西北海淀区的一家医院工作,他们说服了医生,当场在处方上签字盖章,可以买到一副二级药,丁健拿到处方,一路快骑,找到东城区医院的朋友,取得了这副药。

这件事只花了丁健一个整天的时间,他认为在他的经历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讲述历经艰苦找到这副药时,请他帮忙的那个医生非常高兴,深表感谢。丁健猜想这药毫无疑问不是医生自己要用,而是给医生的一位重要病人用的。这位医生自己也深谙关系学。

这个运用关系的特例有许多层次,在请人帮忙的医生与实际开处方的医生之间有三层关系,他们都提供自己的个人关系找药——丁健、丁健在东城医院的朋友、认识专家的朋友。还有一种可能,要丁健找药的医生本人也是关系中的一个层次。我问丁健,这个关系的链条能扩展到多大。他回答说,从理论上关系网可以无限扩大。一个人从底层以这种方式开始搞关系,发现他间接的依赖上层的关系。他承认这件事是个例外,不能当作通则。如果这个链条上出现太多你来我往的情况,就很难保证所要求的东西了。这个过程将变得十分漫长和曲折,人家最终会放弃希望。

“你办完这事以后呢?”我追根究底。

“医生欠我个人情,我先放在那儿,四五年以后,我要一个东西的

^① 关于换算比率,参见致谢部分。

时候,我会再提起它。也就是想休长假,到全国去游游山、玩玩水,这需要几个月不上班,我可能让他给开一张病假条,休个长期病假。”

直到若奔的朋友这夜给我的生动描述,我才决定尽力去理解关系学的活力。对于此领域的探索可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得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动力及张力的某些脉络。这套关系学的策略正好在“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交叉点上,引人近前检视。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关系学

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这些活动和表述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像个人关系所牵涉的权力,及其在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愿望所占的重要性。

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概念是为每一个地方的中国人所共有一种潜在的文化假设;像在 1949 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后的大陆、像在台湾以及像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的地方。然而,与此同时,在 1980—1990 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假设本身与实施交织起一个众声喧哗的自觉过程,它既有公众的形态,也有官方的形态。把个人礼品交换当作是新事物,而成为最近几年逐渐茁壮的社会现象。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我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打交道时,关系学的话题出现频率极高,通常不需要我提示,关系学是个随处可见的主题。它出现在经济交易中,出现在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在文学作品、报纸、学术刊物、戏剧和电影中,出现在民间和官方的话语中。与其他社会实践相比,围绕关系学的辞汇、笑话、谚语和礼仪里,似乎有更具文化的阐述。

研究这些话语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把它当成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描述人际关系的性质和行为的透明的媒介。另一种不仅把这种话语当作是一种表征,还当成存在于自身之中